

思想的力量——人文经济学的浙江溯源与实践

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回响

——访著名考古学家、西北大学校长孙庆伟

■ 本报记者 潘如龙 周宇晗

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,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:“文化很发达的地方,经济照样走在前面。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。”关于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,特别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,总书记有着深邃的思考。在浙江工作期间,他就提出:“浙江在没有特殊政策、没有特殊资源的情况下,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,浙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,而且浙江的文化传统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。”

万年上山、五千年良渚、千年朱鹮、百年红船……当我们跳出当下,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,就能为“走在前列”的浙江,找到来自历史的答案,凝聚奋进未来的力量。近日,本报记者专访著名考古学家、西北大学校长孙庆伟,请他从人文经济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视角,解读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明怎样影响今日的浙江,为浙江未来发展提供启示与思考。

良渚文明的重要地位

记者:如何认识良渚文明的重要性,以及它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?

孙庆伟: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看良渚文明。

一是文明的宽度,也就是文明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。文明有兴衰,如同波浪有波峰有波谷,但绝不会是无源之水。长期以来,由于缺少文字记载等实证依据,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受到国际学术界部分学者的质疑。而良渚古城的发现,一举将中华文明史推至5300年前,并且从根本上打破了黄河流域单一文明起源的观念,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考古实证。习近平总书记任浙江工作时就敏锐指出:“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,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,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!”2016年,他又对良渚遗址申遗作出重要指示。2019年,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,标志着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5000年前的观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。

二是文明的厚度,也可以说是文明的延续性。江浙地区为什么能在宋代以后异军突起,我认为不完全是因为中原王朝政权的南下,江浙地区本就有着深厚的文明底蕴。我们一度认为良渚古城之后,江浙地区的古文化就衰落了,现在看来不尽然。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,包括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、西周时期的姑蔑国遗址、西周晚期至南朝时期的白坦村古墓群等,都印证了浙江地区的区域文明从未中断,且随着时代变迁逐步融入并影响了中原文明。

三是文明的高度,也就是文明的成就。毫不夸张地讲,放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,良渚也是文明的高地。良渚文明孕育了发达的稻作农业,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,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象征与精神信仰,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技术成就。基于以良渚古城为代表的考古发现,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以“冶金术、文字和城市”作为早期文明“三要素”标准的桎梏,创新提出了以“城市、阶级和国家”作为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“中国方案”。

良渚文明的鲜明特征

记者:良渚文明从中华文明“满天星斗”中脱颖而出,以考古学的眼光,结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实际,您认为主要有哪些鲜明特征?

孙庆伟: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,我想大概有这么几个鲜明特征,表明良渚文明是当时的文明高地:

一是生民为本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时,评价其为“东亚



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秋坞水坝遗址。

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供图

和中国5000多年前史前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”。在一些文明还处于狩猎采集阶段时,良渚先民已经把粮食生产视作根本大计。据估算,当时稻米的产量可能达到每亩150公斤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现在良渚遗址周边发现有成体系的稻田和灌溉系统,体现了农业集约化的特色。在农业生产力大发展的基础上,出现了桃子、李子等经济作物,出现了家猪等养殖业和玉器、陶器、漆器、丝织物等手工业产品。而且,良渚时期农业的蓬勃发展,一定不是个人偶发行为,而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,这才会出现池中寺“皇家粮仓”近20万公斤作为国家储备粮的炭化稻谷遗存。

二是创新为基。首先,农耕工具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。良渚时期已经开始用更耐用的石质工具代替木、骨质工具,有石斧、石斧、石犁等,形制功能更加优越。其次,技术创新提升了农业产量和规模。目前还难以判断良渚的稻作是否采取了轮作、施肥、除虫、除草等手段,但是稻米产量这么大,水利设施这么完备完全,可以合理推测良渚人一定掌握了选种育种和科学灌溉的手段。再次,以玉器为代表的礼器体现了文明的守正创新。玉琮在中国史前文明中并不鲜见,但无论从体量还是从制作的精美度、使用的广泛度,在良渚时期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。玉琮是良渚古国最重要的礼器,也有学者认为,良渚玉琮反映了当时的天文观念,它方圆结合,上天下小的造型体现了独特的设计理念,蕴含了良渚先民的某种特殊观念。不管基于何种理念和表达,都反映了良渚人的创新思维。

三是分工发达。良渚时期可以说是百业兴旺,农业、养殖业、手工业都得到发展。分工协作也提升了产业专业化水平。良渚的玉器十分精美,纹饰雕刻有浅浮雕、镂雕、微雕等方式。良渚人甚至能在1毫米的宽度内刻画5道互不重叠的线条。丝织品易腐烂、难保存,但在良渚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绢片、丝绳、丝带等遗存和纺轮等工具,说明良渚时期已经存在养蚕、纺织的技艺。良渚古城被誉为“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”,规模宏大、布局严谨、分工明确、社会井然有序:城内分为宫殿区、内城和外城,建有大型广场和多组高等级建筑,基本上是生活、消费场所。城内居民的粮食供给则来自城外,比如临平茅山等周边地区乃至更远的地方。

四是组织有序。良渚古城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,外城约630万平方米,在古代已经是一个超大城市。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古国的都邑,是权力与信仰中心,相应的还有一些分区,如今上海青浦的福泉山、今江苏苏州的草鞋山、今江苏常州的寺墩等。在如此大的地域范围内,良渚先民要实现国家治理,要进行资源的协调和调度,都离不开强有力的制度设计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就是社会大协作的成果。经测算,

建筑全部11条坝体大约需要860万个人工,若由1万人来建造,大约需要连续不断工作两年半。很显然,只有一个发达的国家体系,才有可能调动这么多人力、物力持续进行工程建设,并完成后勤保障。

五是科技为先。良渚是5300年前的一个科技高地。古城坐北朝南的方位,体现了良渚人对地理知识的掌握;瑶山祭坛遗址四角方向与两分两至(春分秋分、夏至冬至)的日出方向具有惊人的一致性,折射出良渚人对天文学和时间周期的认知;古城外围建有规模宏大的城墙和水利系统,通过精确的选址和土方工程实现防洪、灌溉和运输功能,建造者不仅需要了解力学、水文学和地质学,还要能因地制宜、灵活运用,而因地制宜的背后就是对科学技术的认知。

良渚文明发展传承的当代启示

记者: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来看,您认为良渚文明对江浙一带乃至更广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,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?

孙庆伟:在我看来,改革开放以来,浙江成为我国发展走在前列且最均衡的省份之一,恰恰是5000多年文明的历史回响。其一,良渚文明作为区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,为浙江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和历史积淀。如果把浙江比作一个大家庭,首先这里家底殷实,从良渚到吴越,到南宋再到明清,文脉源远流长。同时家风优良,注重实际、工商皆本、义利并举、创新创业等优秀文化传统历经千年,得以传承和发扬。最后的结果是家道兴旺,如今浙江各行各业欣欣向荣,被国家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历史使命。浙江的发展,生动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“文化很发达的地方,经济照样走在前面”。

其二,良渚文明也能为解码浙江发展提供精神根脉。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,大禹以山川河流为大致界限,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为九州,并按照土地肥沃程度划分9个等级。其中扬州,也就是现在的太湖流域是下下等的,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,那里水患多,多是潮湿的涂泥,加之天气炎热,容易滋生瘟疫。而良渚恰恰是在下下等的环境里创造了同时期最高的文明。并不优越的自然环境,反而倒逼出人的创造力。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,从“七山一水二分田”的资源小省一跃成为经济大省,尤其是民营经济充满活力,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靠前,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习近平同志提出,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“求真务实、诚信和谐、开放图强”的浙江精神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古老良渚和当代浙江是一脉相承的。在我看来,这种精神的力量,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,都是指引浙江发展的独特优势。难怪,苏秉琦先生1977年途经良渚时,指着当时还是一片果林的莫

角山说:“此乃古杭州也。”

其三,良渚先民超强的顺应自然、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,蕴藏着中华文明“天人合一”的生态智慧,能为当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、实现绿色发展提供启示。良渚古城被誉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,我认为它绝对是一座智慧城市。它依托地形、水文、生态,构建起山、水、城、田、湖五位一体的大型复杂城市系统。最典型、最成功的例证是做到了化害为利、与水共生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治水即治国,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。”中原地区为防范水患、方便建城,城址往往选址在避水的台地上。而良渚古城反而选择在水洼上建设,并且依托细密庞大的水系,打造了省时省力的“水上运输网络”,造就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“中华第一城”。

最后,良渚文明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注入了文化基因,揭示了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、历久弥新的影响力与感染力。以玉琮为代表的良渚玉器北抵燕晋、南达广东、西北至甘肃、西南到四川,范围覆盖大半个中国,对中国史前文明乃至传衍至今的东亚玉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良渚水利工程的分级调控思想,在北宋汴梁工程中再现,至今仍可为解决水运问题提供借鉴。良渚古城“以水定形”的规划理念,与杭州西湖“三面云山一面城”的景观格局交相呼应,成为城市空间美学的典范。

总而言之,良渚承载着过去,也启迪着未来。今天,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对良渚文明的研究、传承和利用,深入挖掘良渚文明蕴含的文化基因及其时代价值,做到融贯古今,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文化动力。



扫一扫 看视频



专家简介:孙庆伟,西北大学党委副书记、校长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(考古学组)秘书长。主要从事中国考古学和先秦史教学工作,致力于中华文明起源、三代都邑考古、三代礼制文化、考古学思想史等领域。曾参与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,参加和主持山西晋侯墓地、陕西周原遗址和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工作,发掘成果多次荣获“全国十大考古发现”。

我来讲故事

■ 杨嘉宾

我是土生土长的余杭人。2022年底来到良渚文旅集团工作之前,我和许多杭州人一样,为“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”感到自豪。未曾想到,我有机会以一名建设者的身份,深度参与这座古城遗址在后申遗时代的活化之路,也切身体会到让沉寂的历史文化转化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动能,是一项充满挑战又意义非凡的事业。

如何让这处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遗址真正“活”起来?这是我们面临的核心课题。良渚文化不止于考古发掘,它必须活在今天的生活里、创意里和产业里。因此,我们的所有实践,都围绕着实现文化保护、经济效益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而展开。活化利用,始于对既有空间的尊重与再

造。在文物保护“不搞大拆大建”的刚性要求下,我们将目光投向申遗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既有建筑。坐落于良渚文化大走廊核心区内的原长命印刷厂,东接杭州国家版本馆、良渚博物院,西邻良渚古城遗址,我们经过精心设计,将其改造更新为汇聚文化创意、数字科技与美学体验的“良渚5000+艺创园”,并引进了知名视频创作者“何同学”的项目总部、全国首家手账主题体验馆等新兴业态。艺创园只是我们系统规划中的一环。为了打造一个让设计师、艺术家、文创主理人和村民共同聚集的“良渚文化产业群落”,我们梳理出遗址周边约15万平方米的存量空间,进行主题化开发,让不同的空间与业态不再孤立,而是能够相互滋养、彼此赋能,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生态。为了让良渚文化可以跨越时空,我们运

用AR增强现实技术,让游客通过设备能亲眼“看见”数千年前的古城风貌与生活场景。今年我们更是推出了全球首部良渚文化主题VR沉浸式体验剧,让观众能“穿越”时空,亲历良渚先民的故事。与此同时,我们精心策划了20多款研学产品,并持续举办“良渚生长力”市集、国际毅行大会、森林音乐节等品牌活动。当上万名参与者在古城绿道上奔跑,当年轻人在音乐节中感受古今交融,良渚文化便从教科书和展柜中走出,变成了可感知、可参与、可分享的生动体验。如今,良渚遗址周边的村落早已告别昔日国道旁采石场林立、尘土飞扬的景象,转变为环境清幽、富有文化气息的美丽家园,许多居民成为新业态的参与者或受益者。这种“在保护中发展、以发展促保护,让成果惠及民生”的良性循环,正是我们所追求的

社会效益。回顾这几年的工作,我深感文化产业如同一种高效的“活化剂”,不仅让养在深闺的良渚文化走向世界,更在活化利用过程中塑造地方气质、温润人心,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注入深层动力。展望未来,我们将以良渚古城遗址为核心,联动国家版本馆、良渚博物院二期、良渚客厅等文化设施,将其整体打造为一个能深度体验中华文明精神内涵的“文化目的地”,让每一位来访者不仅能仰望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高峰,更能真切触摸这条古老血脉在当代强劲而鲜活的律动。在这片厚植五千年文明的良渚大地上,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思考与实践让历史遗产焕发新生,让文化根脉滋养人民。(作者为杭州良渚古城文旅集团董事,本报记者王妍妍采访整理)

一线体悟

■ 王姝

2003年,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,“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,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,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!”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至4300年,是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继马家浜文化、崧泽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。经过考古发掘,我们发现良渚文化不仅有发达的稻作农业、门类齐全的手工业,还有明显的阶层分化、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,更有统一的精神信仰以及具备原始文字特征的刻画符号,这些特征表明当时的良渚已经进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发展阶段。2019年申遗成功时,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评价其重要性:“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长江流域对‘多元一体’的中华文明起源作出的卓越贡献,是东亚和中国5000多年前史前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,是人类文明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。”近年来,我们以“文明圣地、世界遗产、国家平台”为战略定位,在保护中发展、在发展中保护,推动良渚实现了从濒危遗址到世界遗产、从静态封存到活态传承、从文化地标到国家平台的历史性跨越。回望良渚的保护之路,我们深刻感受到:文化遗产的永续传承,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支撑;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,同样需要文化遗产提供精神滋养与价值引领。这种文化与经济相互成就的实践,正是我们守护文明根脉、彰显时代价值的核心逻辑。

筑牢保护根基。对于历史文化遗产,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良渚申遗成功以来,我们始终坚持“保护第一”的工作原则,相继建成开放良渚博物院与良渚古城、瑶山、老虎岭三大遗址公园,运用数字技术构建起“1+3”展示体系,系统还原了良渚古城,推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。围绕考古遗址“发掘—保护—研究—利用”全生命周期,打造“良渚遗址5000+”数智管理平台。首创“遗址监管网格”,建成遗址区5座无人机机场,借助无人机、大数据、AI识别算法等,实现多源事件分级分类实时预警联动闭环处置。与敦煌研究院开展战略合作,成立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东南分中心,开展科技攻关、课题研究、人才培养。按照国际一流、国内领先标准,启用全国首个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实验室,首创综合环境控制法保护潮湿环境土遗址新思路。

推动活态传承。良渚文明之所以能跨越几千年依然具有生命力,根本在于其蕴含的人文精神、思想智慧和道德理念能够与当代社会产生共鸣。近年来,我们充分挖掘良渚文化的时代价值,架起从保护到传承的关键桥梁。比如,着力打造良渚文化学术高地,主动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“考古中国”研究,入选“百年百大考古发现”和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项目,成功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,出版《中国早期文明丛书》等各类学术专著600余种,入选世界权威考古学家科林·伦福儒《考古学:理论、方法与实践》。在杭州亚运会举办周期,推动良渚元素深度融入整体设计,成为鲜明标识。

深化创新转化。为破解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的时代命题,我们通过推动良渚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把良渚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融入经济发展中,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优势。我们创造性提出并在省市区联合推动下建设“良渚文化大走廊”,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。编制完成《良渚文化大走廊发展战略与行动规划》,有机串联5000多年良渚文化、2000多年运河文化、1000多年径山禅茶文化等丰富文化资源,滚动实施两期“十大工程”,总投资达166.8亿元,涵盖良渚博物院二期、良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等重点工程。创新“建新城、补老城”反哺机制,将良渚新城土地出让收入的10%专项用于遗址保护。出台大走廊“文化+20条”扶持政策,成功引进“文化+”项目74个,上半年规上“文化+”企业营收实现两位数增长。

促进交流互鉴。2023年10月,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中方将举办“良渚论坛”;同年12月,他向首届“良渚论坛”致重要贺信。如今,“良渚论坛”已成功举办三届,吸引115个国家和地区1300余名嘉宾参与,推动“良渚国际考古中心”“国家重点区域考古标本库房”等10余项国际合作落地。我们着力持续放大“良渚论坛”综合效应,成功举办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、国际大坝委员会第28届大会“古代水坝工程与人类文明发展”专场活动,与英国、希腊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国开展“良渚与世界”对话交流活动,先后赴匈牙利、古巴、墨西哥等国开展文明对话、文化推介、国际巡展等活动,进一步提升良渚文化国际影响力。良渚的故事,正在成为讲好中国故事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文化自信是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”。20余载实践深刻证明,文化不仅是精神旗帜,更是发展动力。保护为发展留存文明底色,传承为发展注入精神内核,转化让发展更具温度,互鉴为发展拓宽视野,最终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,我们将在守正创新中持续深化文化与发展双向赋能,奋力擦亮“五千年中国看良渚”金名片。

【作者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】

● 古城内城城墙东西约1700米、南北约1900米,总面积大约300万平方米,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。

● 良渚外围水利系统影响范围约100平方公里,可拦蓄约53平方公里的水面,总库容量超4600万立方米,分别相当于8个西湖湖面大小和3个西湖蓄水量大小。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用草裹泥等材料堆砌成大型水坝群,其中老虎岭一带的水坝坝顶海拔高度约为20—30米。

● 反山遗址是迄今所见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、种类最为齐全的高等级墓地。在1200余件(组)珍贵文物中,玉器占90%以上,包括国家一级文物“玉琮王”。

● “玉琮王”整器通高8.9厘米,上射径17.1—17.6厘米,下射径16.5—17.5厘米,孔外径5厘米,孔内径3.8厘米,重达6.5千克。

数据来源: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制图:戚建卫